

跨越國境線

台・灣・文・化・系・列

35

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

何義麟◎著



跨越國境線
——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
何義麟◎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跨越國境線——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 何義麟著. -- 初版. -- 臺北縣板橋市：稻鄉，民 95

面；公分

含索引

ISBN 986-7862-86-4 (平裝)

1. 台灣 - 歷史 - 日據時代 (1895-1945)

2. 台灣 - 歷史 光復以後 (1945-)

673.228

95000487

跨越國境線——
近代台灣去殖民化之歷程

著 者：何義麟

出 版：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28 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印 刷：美原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32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I S B N：986-7862-86-4

※破損頁或缺頁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 錄

代序：若林正丈／時間的縱貫性、地理的橫貫性	1
導論——越境的台灣人	5
第一部 殖民解放與祖國意識	13
一、台灣殖民解放運動的先鋒——謝南光	15
二、戰後台灣左翼勢力之言論活動與政治抉擇	61
第二部 近代媒體與大眾社會	89
三、日治時期台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	91
四、戰爭時期台灣傳播媒體之語言問題	117

五、二二八事件中媒體工作者之角色與責任	139
六、戰後初期台灣的印刷媒體與歷史記憶	159
第三部 族群意識與國家認同	187
七、「國語」轉換過程中台灣人族群特質之政治化	189
八、戰後台灣知識份子的日本觀	219
九、戰後台灣抗日運動史之建構 ——以羅福星之革命事蹟為中心	259
總結——語言、媒體與台灣人意識	285
編輯後記	295
索引	299

代序——時間的縱貫性、地理的橫貫性

歷史學是一門時間的學問。不論時間是均質地流動或非均質地流動，從過去到現在必然是有一定方向地流動，不可能倒流。即使是認為人世不斷循環的輪迴史觀，也是以圓形方向前進而重回原點。到了近代，這樣的時間流動觀似乎已經與「縱」的方向感結合起來。換言之，近代歷史學是以「時間的縱貫性」為基礎。

然而，歷史學並非因此而不處理「橫」面向之變化。除了採取極端的「內在式發展」史觀之外，「縱」方向流動的歷史潮流中，產生轉變的因素包括移民、貿易、侵略、殖民統治等，都是具有「橫」面向意涵之變動。這部份可以說是歷史學「地理的橫貫性」之情勢變化。雖然如此，在這裡面還是有「時間的縱貫性」貫穿其間。換言之，歷史學將這種「地理的橫貫性」還是以「縱的縱貫性」方式來處理。因為歷史學是把移民的人、被交易的財貨、因侵略或殖民統治的移動，以及反映出來的權力動向等，都是放在時間軸上觀察其產生的影響。

觀察「地理的橫貫性」時，被視為問題點的是「疆界」。人物、財貨、權力在移動或具體反映其影響力時，到底形成、維持

或打破哪一種疆界呢？甚至疆界本身就在移動呢？進入近代這個階段，帝國、國民國家或是以國民國家為核心而周邊擁有殖民地之「國民帝國」¹的時代，形成的特殊疆界都是「國界」。近代的「國界」必然是受內部擁有排他性統治權的政治體嚴格地控制，這樣的國家也必定同時儘可能地想將國界內空間之政治面、法制面、文化面等均質化。

「國民帝國」是「帝國」的近代型態，其內部之殖民地是一個被兩種界線所區隔的空間。這兩種界線包括前述所謂的「國界」，以及殖民地與採取國民國家型態的核心政治體之間的界線。近代日本殖民帝國對此一界線是用「內地」與「外地」這樣的用語來表現，而所謂殖民政策之中心課題，就是如何確立、維持並管理這兩種界線。由於殖民地被統治的民眾被放置在這兩種界線之間，因此必然經常處於自我認同不斷受到衝擊的「制度性極限狀態（institutional liminality）」。²所謂「同化主義」此一殖民政策之類型，就是核心政治體之統治菁英要求殖民地住民同化於其所宣揚的文明（法國殖民帝國）、文化（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殖民帝國）或兩者的綜合體（皇民化運動以前的日本殖民帝國），但實際政策又堅決地想維持殖民地與核心國民國家之界線。根據

¹ 「國民帝國」的概念是根據山室信一的研究。請參閱：第三章〈「國民帝國」論の射程〉，山本有造編《帝國の研究——原理・類型・關係》（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3年），頁87-128。

² 「制度性極限狀態」之概念是根據吳叡人的說法。請參閱：Rwei-Ren Wu, *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Chicago: Doctor thesis,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 of Chicago, 2003)。

駒込武的研究，日本殖民帝國的「內地／外地」的界線是建立在「血緣民族主義」之上，但爲了維持這個界線，甚至還拒絕賦予居住「外地」住民之公民權。³這一點可以說是「同化主義」理念中，所謂「制度性極限狀態」最突顯的一種問題呈現。

如上所述，那麼所謂的「去殖民化」就是要將消除核心政治體與殖民地之界線，因爲這是形成「制度性極限狀態」之製造裝置，同時也要讓經歷殖民統治的民眾獲得自己的尊嚴。眾所皆知，近代殖民帝國是「國民帝國」，亦即帝國之核心政治體是國民國家。因此，戰後的去殖民化，主要是核心政治體與舊殖民地之界線轉換成同爲國民國家之界線。然而，戰後是美國與蘇聯兩個超領域政治體對立、抗衡的時代，兩者所操控下的國際秩序，實際上是回到所謂冷戰的帝國時代。在這個情況下，獲得存續的新興國民國家，其內部往往出現所謂的「再殖民化」現象。亦即，過去曾在核心政治體之內，或是殖民地時期好不容易藉由「近代性（modernity）」之實現而獲得的個人解放契機，再次遭到阻絕。因此，從殖民地時期到今日，出現了世界性的殖民地・舊殖民地民眾之各種「越境」現象。

「越境」也是一種被「時間的縱貫性」所吸納的「地理的縱貫性」之現象。根據何義麟的研究，殖民地民族主義是殖民地被統治住民企圖重劃自己「國界」的思想與運動，因此找出「越境的台灣人」，透過他們思想與行動軌跡之分析，釐清近代台灣人

³ 賦予日本本國公民權利與義務的法律是戶籍法，但日本殖民帝國直到瓦解之前，依然沒有讓這項法律適用於台灣與朝鮮。請參閱：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頁358。

是走過哪些「界線」？到底他們是安住於既定的界線內，還是企圖跨越界線，甚至尋求建構台灣人自己理想安穩的界線呢？透過這類相關問題的探討，正好可以描繪出形塑「台灣人」的近代史。何義麟新書中似乎明顯地抱持著這樣的企圖心。

以上是拜讀何義麟新書原稿獲得的感想，僅以所感代為之序。

若林正文

2005 年 12 月 21 日 日本・相模原市寓所

導論——越境的台灣人

1895 年以後的歷史發展，讓台灣島上居民經歷兩次國籍歸屬之變更，在時間上當時台灣的住民都曾跨越了中日兩國之國境線。本書所探討的部份知識份子，在行動上往往跨越了地理上中日兩國的國界，他們從事的政治社會運動之基本理念，也大多具有跨越國境線之意圖。所謂跨越國境線，包含了時間、空間與精神上的三個層次，如此多重越境的歷史形塑了台灣人。被殖民的時代，許多台灣人曾激烈抗拒命運的安排，展開各種抗爭的活動，本書內容主要就是探討這段台灣人尋求自主的去殖民化歷程。

探討近代台灣去殖民化的歷程，首先必須說明本書所界定的「近代」以及何謂「去殖民化」。台灣何時進入「近代」在學界可能有不同的說法，本文中所謂的「近代」是指 1920 年代以後的台灣。因為，這個時代的台灣人開始有了明確的自我主張。例如，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領導人開始強調：「咱是開拓者，不是憨奴才」（蔡培火作之歌詞）；有人強烈要求：台灣必須成為「台灣人的台灣」。這種訴求背後所存在的「台灣人意識」為何在此時形成？日後經過怎樣的轉折？是否影響到今日台灣住民的族群意識與國家

認同呢？這些都是本書所關心的主題。一般而言，台灣史的時代區分，往往依照政權的更替來劃定，由於本書所涉及的範圍從 1920 年代到戰後初期，跨越日治與戰後兩個時代，因此採用「近代」一詞算是打破政權做為時代區隔的嘗試，希望能藉此克服台灣殖民地史與戰後史斷裂的問題。

面對殖民地史與戰後史的發展，台灣學術界經常使用「斷層」、「跨越」等語詞說明。例如：文學界形容接受完整日本殖民教育，戰後克服語言困境改用中文創作的作家為：「跨越語言的一代」。¹少數人也許跨越了語言的障礙，但是在台灣社會許多層面，特別是研究這段時期的人文社會學術圈，1945 年似乎還存在一些難以跨越的鴻溝，因為大家對於戰後初期這段歷史還存在不少嚴重的認知差距。例如：是否可以用「再殖民（re-colonization）」來形容戰後台灣歷史發展的問題，台灣文學研究者之間曾出現嚴重對立的見解。²另外，台灣史學界也有不同的用法。根據鍾淑敏對台灣總督府經營海南島，以及台灣人前往該地發展的研究發現，總督府曾積極將殖民統治台灣的技術移植到海南島，這時被殖民的台灣人靠著資金與技術搖身一變成為殖民者。對於這種現象，

¹ 據聞「跨越語言的一代」是詩人林亨泰在 1967 年首先提出，意指他們同世代接受日文教育、用日文創作，而戰後必須改以中文創作的文筆工作者。請參閱：余昭玟，〈從語言跨越到文學建構〉（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3 年）。

² 有關「再殖民」一詞的問題，呂正惠曾舉出各種論點，逐一反駁陳芳明將台灣文學史分為：殖民時期、再殖民時期、後殖民時期之論述。詳細內容請參閱：呂正惠，〈陳芳明「再殖民論」質疑〉，《台灣文學殖民地的傷痕》（台北：人間出版社，2002 年），頁 147-197。

她歸納整理後稱之為台灣的「再殖民」。³雖然，「再殖民」一詞有這些爭議，甚至有如此不同的用法。但筆者還是認為，將戰後國民黨的統治稱之為「再殖民」，應該是一個頗為貼切的描述。特別是二二八事件之後，許多台灣人開始明顯表露對國民黨政府的厭惡，再經歷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之後，更多受虐的台灣人甚至認定「國民黨」比「日本人」更糟糕，因此用「再殖民」來形容戰後國民黨的統治並無不妥。

基於上述的認知，進一步想要釐清 1920 年到戰後初期這段台灣史的轉折，本書選擇用「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一詞來說明。1993 年岩波書店出版的「近代日本と植民地」講座第八冊《アジアの冷戦と脱植民地化》一書前言之中，三谷太一郎對「去殖民化」一詞有清楚的界定，他認為所謂「脫植民地化」具有以下雙層意涵。第一，遭受日本帝國等殖民統治或佔領地區脫離被殖民地位的過程。第二，日本本身放棄對外擴張的行為，清算自身「帝國」的過去。⁴對於台灣而言，所謂的「脫植民地化」當然是指前者。但是本文為避免遭到誤解，不採用這種「和製漢語」的表現，而選擇台灣較常見的「去殖民化」一詞。

根據廖炳惠所編撰文學與批評研究關鍵詞解說一書，decolonization 被譯為「脫離殖民」。作者在文中說明：1960 年代

³ 鍾淑敏，〈殖民と再殖民——日本統治時代の台湾と海南島との関係の研究〉，「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植民地台湾をめぐる日本・中国・南洋——帝国・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ネットワーク」學術研討會（日本北海道大学主辦，2005 年 9 月 2-4 日）。

⁴ 三谷太一郎，〈まえがき〉，《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と植民地 アジアの冷戦と脱植民地化》（東京：岩波書店，1993 年），頁 5-18。

許多人以「後殖民 (postcolonial)」來形容脫離殖民的情境，但在 1980 年代「文學後殖民主義 (literary postcolonialism)」盛行的時候，卻將這類獨立的機制，向前追溯至更早期的運動。本書不是「後殖民研究」，但是將後殖民的問題往前追溯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目標則是一致的。戰後台灣史的問題必須追根究底，當然必須探究戰前的歷史情境。然而，殖民時代的台灣抗日民族運動史卻不適合用「脫離殖民」來形容，應該是採用「反殖民 (anti-colonial)」較為適當。⁵本書所謂的「去殖民化」就是指結合「反殖民」與「脫離殖民」這兩個語彙之意涵，並用來形容 1920 年代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興起、1930 年代以後的轉化，以及戰後初期爭取自主的行動如何中挫而潛伏之歷程。

筆者過去的研究範疇一直是以台灣社會菁英為焦點，主要重心是集中在抗日知識份子之活動與政治理念之探討，檢視戰前台灣知識份子如何從事抗日運動，同時也分析他們殖民解放之思想、國家或民族認同上的轉折。筆者對於這項台灣近代政治史上之議題，在時間上，跨越傳統生硬的「日治」與「戰後」之分期界線，全面掌握 1920 年代至 1950 年代以前台灣全體社會菁英（包含抗日者與殖民體制協力者）之活動。其次，在空間上，同時涵蓋了台灣本島與中國大陸等島外台灣人之動向。最後，透過上述時空座標軸的縱橫交錯分析，將研究焦點集中於 1947 年之二二八事件。

透過分析這段時期較活躍的歷史人物之言論，我們可以發現

⁵ 廖炳惠編，《關鍵詞 200 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出版，2003 年），頁 20、71。

生長在殖民地台灣的知識份子，面對現實社會的歧視，逐漸形成所謂的「台灣人意識」。然而，當追求殖民地解放受挫之後，他們的台灣人意識往往會經過轉化，特別是離開本島的抗日知識份子，經常面對漢族「祖國」與殖民「母國」抉擇的「兩難」(dilemma)情境。本書介紹的中心人物謝南光與王白淵，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謝南光，本名謝春木，出生於彰化縣二林。完成學業後，投入抗日民族運動，成為台灣民眾黨重要幹部，也是殖民地解放運動的理論旗手。1931年民眾黨被禁止活動後，離開台灣前往上海，繼續他另一階段的抗日活動。抗戰期間，他成為「台灣革命同盟會」的領導人，積極向國民政府鼓吹收復台灣。最後，台灣如其所願，達成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目標。因此，我們將謝南光稱之為「台灣殖民解放運動的先鋒」應無不妥。

然而，日後他的命運卻與許多投身效力國民政府抗戰行列的台灣人大不相同。戰後，謝南光並未返台任職，而是前往東京擔任中國駐日代表團的高官，1949年中共建國後，他選擇了「新中國」，1952年離開日本前往北京。戰後，他發表的言論與政治抉擇對許多經歷左翼思想洗禮的台灣青年，似乎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以其行動軌跡為主軸，正好可以說明並印證，戰後台灣人在「兩個中國」之間，採取何種政治抉擇，其背後的政治思想與民族認同，正好說明戰後台灣的歷史轉折。

1931年12月11日，謝南光搭乘福建丸離開基隆港時，曾經感嘆地說：「基隆古名雞籠，當我們搭船離開基隆時，想到今日在台灣所面臨的悲哀現狀，就像走出雞的籠子般鬆了一口氣，因此

若用古名似乎較為適切。」⁶如此的感嘆充分地反映出日本時代抗日知識份子的心境。相同地，1996年經歷白色恐怖的柯旗化出版其回憶錄時，書名為《台灣監獄島》，從書名到內容都充分突顯了戰後台灣知識份子的處境。⁷抱持相同苦惱的兩位知識份子，事實上是立足於不同的國族想像，對於這類跨越兩個時代卻具有相同苦惱的歷史人物，我們應該可以用「越境的台灣人」來稱呼，這類人物言行正是本書關心的焦點。

另一位「越境的台灣人」王白淵，彰化二水人，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先在公學校任教，1925年赴日就讀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任職於盛岡女子師範學校。雖然他並未參加島內抗日團體，但因加入東京台灣人左翼文化團體而被學校革職，以致捲入政治的漩渦。隨後前往上海，1937年因抗日活動遭日警逮捕，並送回台灣服刑。戰後他積極投入各種文化活動，可惜這些言論活動不見容於當局，經常遭到逮捕監禁的命運。王白淵是個詩人、作家，他的詩文除了具有藝術性，對於時代的苦悶，台灣人的命運也有深刻的反思。因此，王白淵的國家認同的變化也相當值得關注。王白淵在其〈甘地與印度的獨立運動〉一文中，特別強調：「歷史乃是邁向解放的過程，數千年漫長的一部人類史，實係自解放至解放的連續，是由鬥爭到鬥爭不斷苦惱的容姿。」⁸這段話應該是

⁶ 追風生，〈民國だより〉，《台灣新民報》396號，1932年1月，第12版（原文日文，筆者中譯）。

⁷ 柯旗化，《台灣監獄島》（高雄：第一出版社，2002年修訂再版）。

⁸ 日文原文出自：王白淵，《荊棘の道》（盛岡：久保庄書店，1931年）。譯文轉引自：陳才崑，《王白淵·荊棘的道路》（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頁169。

假借印度來談台灣的歷史情境，文中的鬥爭與苦惱應該不只是王白淵個人的苦惱，而是所有曾經深刻思考台灣人國族認同問題之歷史人物相同的苦惱。⁹

當然，觀察戰後台灣知識份子的言論思想，不能只限於這類特殊的人物，本書提及活躍於戰後台灣的文化人，依照其籍貫與經歷可分為：大陸來台知識份子、台灣本地知識份子，以及參加抗戰的祖國派台灣人（半山）等三類。這些人物之中，大陸來台官員與學者發言最為積極。其次，本地士紳型的知識份子因語言能力問題，報紙日文欄被廢除後，發言上明顯處於劣勢。此外，言論活動較積極的台灣人，大多是具有祖國經驗與白話文寫作能力者，而左翼的知識分子在媒體上特別活躍也值得特別注意。本書對於台灣人的祖國意識有較深入的分析，但是回顧戰前到戰後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其實是具有相當複雜的面向。特別是 1930 年代台灣人意識萌芽的階段，台灣知識份子為了追求「去殖民化」之目標，甚至出現大亞細亞主義的思想。其中，王白淵的詩集就是一個代表性的例子。在這裡借用王白淵詩集《荊棘的道路》之「序詩」¹⁰當作本書之開卷語。

太陽東昇之前

精靈的蝴蝶飛向彼方的地平線

太陽の出ない前に魂の胡蝶は

地平の彼方へと飛んで行く

⁹ 近年來有關王白淵的研究論著不少，其中以柳書琴之博士論文及日後之一系列研究最具代表性。柳書琴，〈荊棘的道路：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1 年 7 月）。

¹⁰ 日文原文出自：王白淵，《荊棘の道》，頁 1 之前。譯文轉引自：陳才崑，《王白淵·荊棘的道路》，目錄前頁。

你也知道——這隻蝴蝶的去向

朋友

為了咱們共同的理想

撤除界標

——飛向高貴戰地的彼方

君も知る——この胡蝶の行方

友よ

共同の作業のために

標介柱を撤廃しよう

尊き戦地の彼方へ——

我也知道 你也知道

地平線彼方的光芒

東天黎明的徵兆

朋友

應該彼此兄弟相待

撤除國界的墓標

——為了我們神聖的亞細亞

吾も知る——君も知る

地平の彼方の光

東天に輝く黎明のしるし

友よ

お互に兄弟たるべし

国境の墓標を撤廃しよう

聖なる吾等の亜細亞のために

1930.2.5

1930年代王白淵這首撤除「國界墓標」的浪漫呼籲，沒有任何實現的機會。在近期之內，東亞地區潛藏的是民族主義衝突的危機，當然更看不到實現這種理想的可能。我們可以欣賞王白淵的情懷，但面對近代台灣史，我們更應該了解，對於國境線不斷地被重劃的抗拒，甚至企圖描繪出「台灣共和國」國境線的努力，才是近代台灣「去殖民化」的真實歷程。希望本書能傳達跨越兩個時代台灣人之苦惱，同時也企盼本書的研究成果可以提供正在為「台灣民族主義」苦惱之人士一些歷史的借鏡。